

大战略

邓小平与祖国统一

王红续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大战略

邓小平与祖国统一

王红续/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王红续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7

ISBN 7-80195-114-X

I. 大... II. 王...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一生平事迹②台湾统一—史料 IV. ①A762②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458 号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

作 者 / 王红续 著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2/3/5/6

邮购热线 / (010)68992190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 8

字 数 / 196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5-114-X/D·119

定 价 /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导 论	(1)
一、毛泽东的战略得失与祖国统一	(2)
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托	(6)
三、邓小平: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	(8)
四、国家发展战略的精心设计	(13)
五、外交战略的大调整	(17)
六、大战略棋局中的祖国统一	(19)
七、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和策略指导	(22)
 第一章 从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24)
一、台湾问题的缘起	(25)
二、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	(33)
三、邓小平主持中美建交谈判	(38)
四、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43)
五、“一国两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7)
 第二章 “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	(53)
一、毛泽东对香港和澳门的战略“打算”	(53)
二、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60)
三、英方派港督“探路”	(63)
四、邓小平继续向投资者做保证	(70)

五、邓小平说：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	(73)
六、亲自向香港人士做调查研究	(75)
七、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政策	(77)
 第三章 香港主权不容讨论	(82)
一、“铁女人”——撒切尔夫人	(83)
二、马岛之战与“福克兰精神”	(84)
三、访华前的决策	(86)
四、邓小平定下谈判立场和策略	(90)
五、与中国总理交锋	(92)
六、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可讨论！	(95)
 第四章 给英国人一个台阶下	(99)
一、僵局	(99)
二、两手准备	(103)
三、英方回了一个刁钻的“球”	(106)
四、邓小平以灵活的策略打开僵局	(108)
 第五章 治权与主权不可分割	(112)
一、“三脚凳”：老谋深算的一招	(112)
二、英方打出“民意牌”和“经济牌”	(115)
三、邓小平会见希思，劝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 治权问题	(119)
四、撒切尔夫人又后退半步	(122)
五、英方丢掉幻想，准备合作	(124)

第六章 中英达成联合声明	(129)
一、合作基调下的争议	(129)
二、英国外相春季来访	(135)
三、“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	(138)
四、邓小平对香港过渡期的忧虑	(142)
五、与杰弗里·豪谈过渡期问题	(145)
六、邓小平对香港知名人士说:“中国人说话是 算数的”	(149)
七、中英联合声明的达成	(151)
八、与港澳国庆观礼团同胞一席谈	(152)
九、邓小平对英国首相说:“告诉全世界的人: 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154)
 第七章 指导起草香港“小宪法”	(160)
一、基本法宜粗不宜细	(161)
二、香港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模式	(168)
三、基本法:“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172)
 第八章 从容应对香港后过渡期的风波	(176)
一、英方对签订联合声明有些后悔	(176)
二、伦敦当局接连打出几张“牌”	(180)
三、“玫瑰园计划”引起的纷争	(186)
四、英国任命“强势”末代港督	(193)
五、政改方案引起中英对抗	(195)
六、奉陪到底	(199)
七、“另起炉灶”	(201)

八、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205)
 第九章 澳门前途问题的顺利解决 ·····	(209)
一、解决澳门问题最佳时机的到来 ·····	(209)
二、葡萄牙总统访华与谈判机构的组成 ·····	(211)
三、进展顺利的第一阶段会谈 ·····	(214)
四、“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世纪” ·····	(216)
五、第四轮会谈与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 ·····	(218)
六、邓小平向葡萄牙总理谈“一国两制”的可行性 ·····	(221)
七、澳门的顺利过渡 ·····	(222)
 第十章 “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 ·····	(226)
一、批评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	(227)
二、反对里根提升美台关系的倾向 ·····	(229)
三、促成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 ·····	(232)
四、继续批评美国对台政策的摇摆性 ·····	(235)
五、希望美国对中国的统一有所作为 ·····	(237)
六、耐心地做台湾当局的工作 ·····	(240)
七、积极促进两岸沟通 ·····	(243)
八、第三代领导集体迎接挑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	(247)
 后 记 ·····	(250)

导 论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位战略家。1977 年以前，中国大战略的总设计师一直是毛泽东。1978 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大战略的总设计师。他彻底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重新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大战略，提出了总揽全局的三大任务，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和平崛起的崭新道路。

祖国统一是整个国家大战略棋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国家大战略是由内政和外交两大部分构成。而中国又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祖国统一问题，因此，中国的国家大战略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邓小平提出的三大任务。内政决定外交，外交为内政服务，是内政的延伸。国家统一实质上就是内政，但又是特殊的内政，是与外交联系极为密切的内政。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国家大战略系统构思的优劣和实现程度。内政目标的实现，是促进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国内条件，同时，外交目标的实现，则为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当然，统一任务的实现或阶段性实现，会给内政和外交任务的完成带来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国家大战略系统整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过程。

现代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关系愈来愈密切，外交的作用日益增大。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任何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即使是由内战等原因造成的，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国际背景，更不用说是由殖民主义的侵略造成的。而国内分裂势力的强弱，是与其背后外国势力的强弱和支持力度直接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祖国统一问题，主要涉及

台湾、香港和澳门。香港和澳门问题是由英国和葡萄牙对中国的殖民侵略造成的。而台湾问题，虽由国内因素引起，但因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插手，而成为祖国统一的最大难点问题。

一、毛泽东的战略得失与祖国统一

1949年前，毛泽东从他深刻洞察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设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战略。首先，规定了正确的战略目标：抓住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人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次，规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工作重点或主要革命形式：进行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武装阶级斗争。第三，规定了完成革命任务的战略力量配置：争取和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农民为最主要的力量来源，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第四，依据敌我力量和潜在力量在中国这片国土上的空间分布特点，规划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推进道路。第五，审时度势，根据每一时期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加速革命进程或保存和巩固已有的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极端的屠杀政策，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地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毛泽东审时度势，认定湖南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的条件远不具备。为了保存弱小的革命军队，避免被强大的敌军消灭，他决然带领起义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转向井冈山。在避开险境的同时，又在农村和山区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充分利用不同阶段的不同条件和环境，采取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抗日战争初期，他抓住日本侵略军一味推进、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的机遇，制定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将八路军和新四军3万人适时地实施战略

展开，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地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在1941—1942年的极端困难阶段里，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克服了各种困难，保存和巩固了已有成果；在抗日战争后期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有利的条件下，毛泽东又充分利用难得的机遇，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并运用大生产和整风两大武器，极大地增强了党和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到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扩大到近100万人，解放区人口达到1亿多，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也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共之间力量悬殊的态势，军队在数量上已上升到国民党当时150万军队的三分之二左右，同时在政治思想影响力方面，共产党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则失去大部分民心。这些都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及此后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和扩大这些有利条件，仅用3年时间，就领导人民打败了美国大力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建国后，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在对外关系方面，他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祖国统一方面，他也进行了精心的战略运筹。

1949年2月，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几天的长谈中，毛泽东还就台湾、西藏和香港、澳门问题对苏联客人说了下面一篇话：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

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80-381页）

这就是建国前夕，毛泽东对祖国统一四大难点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思考和设计。西藏是大陆统一的难点问题；其他三个地区都是“海岛”，其中台湾是中国第一大海岛，而且与大陆之间隔着一个很宽的海峡，又有美国插手，更是祖国统一的难点问题。毛泽东显然把这四个地区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西藏和台湾，必须进行统一，只不过他认为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插手而更复杂、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决；第二类包括香港和澳门两地，不需要立即进行统一，反而应保持现状，以便利用它们的特殊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按照上述战略设想，一方面命令进军华南的第四野战军不对香港和澳门发动进攻，让英国和葡萄牙继续管治这两个地区，并在后来很长的时期内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另一方面，则命令进军东南沿海的第三野战军积极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同时又命令以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为主、进军西北的第一野战军配合，解决西藏问题。事实上，西藏问题很快就得到顺利解决，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但是，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人民解放军无法渡海作战，使台湾问题被迫长期搁置下来。

建国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改变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极不公平合理的关系，以打破和改造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解决中国社会中尖锐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在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落

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正确地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进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重新把阶级矛盾当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愈来愈把人为的阶级斗争作为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对全局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极大的失误，最终发动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晚年毛泽东发生了战略迷误。其根源在于对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和推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的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都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地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强大对手的严峻挑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点逐渐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所取代。而毛泽东并没有洞察已露出端倪的新的时代特征。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情特点作出了错误的推论。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说过：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这就是“穷则革命富则变修”的思想。因此，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设计的战略目标是，要走向生活并不富裕但分配平均、所有制“一大二公”、思想纯洁的自我封闭的社会主义“理想”境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国家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个人不断进行的“斗私批修”来达到这种理想境界。

毛泽东既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他所探索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能不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晚

年尽管在社会主义目标和道路上产生了战略迷误，但他在外交战略方面却开创了新的局面。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当然，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为了建立从日本、西欧到美国的“一条线”，对付来自北方的严重军事威胁。而在客观上，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广泛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合作打开了大门。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停滞、政治动乱和文化凋敝的国内形势，从根本上压制了祖国统一大业，使之无法提上日程。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忽略这个大问题，并且还有让邓小平等担负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使命的意愿。

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托

毛泽东一向器重邓小平。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曾指着随他访苏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第二年，毛泽东告诉来访的赫鲁晓夫：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把林彪树为他的唯一的接班人。林彪出逃身亡，才使毛泽东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邓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又开始重用邓小平。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他还当场送给邓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1975年初，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邓小平担任上述党政军要职还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泽东给予邓小平很高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1 页）

下面这件事表露了晚年毛泽东欲把祖国统一重任托给邓小平的明确意愿。

1974 年 5 月 24 日，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 月 24 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副外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希思。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这时，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总理：“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 1898 年租给他们的，租期 99 年，到 1997 年期满，距现在还有 23 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毛泽东用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第 602-606 页；另见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 年第 3 期）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有生之年是不打算把恢复对香港主权问题列上议事日程了，而是把这一使命委托给了邓小平等更年轻的领导人。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将在未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邓小平遵从了毛泽东的嘱咐，不仅要担负起领导恢复对香港主权的大任，而且要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早就展露了杰出的才能。20 世纪 50 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

野战军政委，协助毛泽东，为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5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1951年5月正式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以这“十大政策”为基础的。协助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得到的经验，为邓小平以后独立地领导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的进程，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毛泽东不但想把国家统一的重担压在邓小平身上，而且想让邓小平遵循他晚年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担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任。为此，他甚至想让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基调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极为珍视。然而，邓小平却予以婉言拒绝，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同时，邓小平1975年领导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在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实行一条“以现代化建设为纲”的新路线。在“四人帮”的极力挑唆下，毛泽东终于再次打倒了邓小平。

三、邓小平：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

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造就了治国兴邦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16岁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8岁加入革命队伍，22岁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学习马列主义。1926年底，23岁的邓小平由苏联回国，先到冯玉祥的军队中从事学校工作。半年后，他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12月，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

作。1929年夏，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组织和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了中央苏区“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被错误地解除了领导职务。毛泽东后来曾说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在这次挨整的日子里，他失去了当时的妻子。

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举行了战略大转移。邓小平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也出席了这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并第二次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开始了13年的刘邓“搭档”合作关系，后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成为一个独立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解放战争中，他与刘伯承率十几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成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先锋。邓小平还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建国初期，他从西南被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秘书长，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成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经历了第二次巨大的挫折，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流放江西。

林彪的自我爆炸，使邓小平的命运再次获得转机。他在江西听到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1972年8月对邓小平这封信作了结论性的批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并经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于1973年3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历经磨难，铸造了邓小平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性格。他不

怕鬼，不信邪，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碰硬，不怕摸老虎屁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被重新起用后，对猖狂一时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敢顶敢斗，不怕捅“马蜂窝”，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对于江青等人处处设陷阱、随手抓辫子的做法，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他自己就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不怕江青等抓辫子。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邓小平的人品和性格。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他为了挽救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发展生产，扭转“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他敢于负责，不怕再次被打倒。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势力盘根错节，占了上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然而，一年多以后，邓小平又重登中国政治舞台，又以不怕冒风险、敢于试验的顽强意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

邓小平多谋善断，但不主观盲动。他是一位真正的实事求是派。在这一点上，他是实事求是原则倡导者毛泽东的最好的学生。正因为遵循了这条基本原则，他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从神还原为平凡的伟人。同样，因为遵循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和当地人民的要求。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统一。1981年2月14日，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了30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后，他又为中国的富强和统一而努力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果断地抛弃了过去那些“左”的做法，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